

朱若愚堅忍實幹

朱若愚從民國二十二年參加戴笠先生領導的工作，一直到抗戰勝利的前一年，十二年間，始終沒有離開過湖北省境。由漢口站長而兼湖北站副站長，而湖北站長兼湖北省保安處第四科科長兼湖北緝私處副處長，貨運管理處處長，可以說是戴先生在湖北方面的重要幹部。

朱若愚爲人忠厚廉潔，絲毫不苟；腳踏實地，小心謹慎。他不與人爭功，不自我標榜；不怕艱難，不怕困苦。他同戴先生沒有任何淵源，而戴先生對他非常倚重，付以重大責任，完全是從工作中認識他，從工作中信任他的結果。

偵破刺楊案的謎底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湖北省政府主席楊永泰在漢口到武昌的長江渡船碼頭上，被刺殞命，兇手陳變超（真名譚戎軒）當場捕獲。陳係貴州人，脫離軍隊不久。當時朱若愚是湖北站副站長兼漢口站站長，陳變超關在漢口公安局偵緝隊，因爲案情太重了，他也去偵緝隊，看看兇手是個甚麼樣

子。兇手年紀很輕，看樣子並不像個爲非作歹的人，他隨便問了一句話：「你年紀輕輕，爲甚麼要幹殺人的勾當？」

「我是奉中央黨部的命令殺漢奸呀！」陳變超答話時的神情，理直氣壯，不以爲犯了國法，好像自以爲是一個愛國英雄的樣子。

這個案子審訊了一個多星期，南京局本部還派司法科長余鐸到漢口，督導工作。可是沒有問出甚麼結果，正準備回南京。朱若愚想到陳變超所說的話和說話時的神態，他覺得這個案子並不簡單，其中一定有大的政治陰謀，應當弄個水落石出，不能輕易放過去。他想陳變超只不過是個被利用的殺人兇手，幕後一定有主持人，這個幕後主持人是誰？必須追問出來。於是，他要求由他試問試問。湖北站長兼保安處謀報股長廖樹東正爲這個案子沒有發展而苦悶，當然歡迎朱若愚牛刀一試。

朱若愚用談話方式，和陳變超很輕鬆地閒聊，陳變超好像對他沒有敵意，談得很投機。他告訴陳變超：「楊永泰並不是漢奸，中央黨部也絕對不會下這種殺人的命令，一定是人家利用你，你上了人家的當。」過去審訊，陳變超一口咬定是殺漢奸，不承認還有別人參與謀殺。經過朱若愚一番談話，他曾沉思，默想，國民政府怎麼會讓漢奸當主席呢？陳變超好像做了一場惡夢，突然醒悟。於是他同朱若愚說了實話，說了許多過去不曾說過的話，他聽說他們這個殺人集團先是奉命到廬山行刺 委員長，因爲無法下手，才來武漢謀殺楊永泰，他是在漢口加入他們的集團的。龔柏舟等幾個人來漢口已經很久，他常見他們在法

租界鐵路飯店，花天酒地，花錢根本不在乎。龔柏舟同一個叫做老三的妓女很要好，老三經常到鐵路飯店找他。根據陳變超所說，朱若愚立刻採取行動，他到鐵路飯店開了一個房間，要茶房給他叫老三。

「先生！叫老三的姑娘多的是，你家要叫那一個老三？」茶房看見朱若愚土裏土氣，完完全全是個外行，笑着問他。

「就叫常來你們這裏的那個老三好了。」一會兒老三來了，經他一談，正是陳變超所說的那個老三。不過，老三聽到他問龔柏舟，知道他不是嫖客，而是辦案的人員，立刻露出驚惶失措的樣子，支吾其詞，祇承認龔柏舟是她的普通客人，並沒有更深的關係。她不知道龔柏舟住在那裏，更不知道他的行蹤。經過朱若愚再三開導，說服再說服，向她保證，祇要他協助辦案，立了功，替她贖身，搭救她脫離火坑。

經過六七個鐘頭談話，老三才被說服。據他所知，案子發生的第二天，一個最重要的人物就離開武漢，到上海去了，龔柏舟也在前一天，搭乘日本輪船東下。龔答應帶她到上海，所以，她的一部分衣服也被帶走了。臨行，龔柏舟還告訴她，並不一直到上海，中途要上一次岸，不過沒有說在甚麼地方上岸。朱若愚問清楚龔柏舟的身材、面貌、衣着、說話的口音、頭髮的式樣，已經是夜裏兩三點鐘了。他不敢遲慢，一分一秒都得爭取，趕緊去找局本部的司法科長，把司法科長從夢中叫醒，要他趕緊打電話到南京，立刻通知沿江各碼頭的同志，根據已知情況，截留龔柏舟。

特務處同志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效率，確非一般可比，天還沒有亮，沿江各個重要碼頭已經接到通知。

先是九江方面的同志趕緊到碼頭上去查，那條日本江輪已經過去，立刻電告南京，預計甚麼時候可到蕪湖。蕪湖方面接到電話，趕到碼頭，知道那條船還沒有到達。辦案的同志守候在碼頭上，在輪船尚未靠碼頭，他們就先上船去查看，果然有一個乘客的身材、像貌、衣著和南京指示的一模一樣，等他一上岸，立刻逮捕。此時漢口方面用飛機把老三送到南京，再乘汽車送到蕪湖認人。龔柏舟一看見老三，面色都變了，他再有能耐，也無法抵賴。

從龔柏舟身上發展，才知道這個案子的主犯，原來是前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劉蘆隱，難怪陳變超說他殺人是奉中央黨部的命令。劉蘆隱祕密組織「新國民黨」、「中國國民黨革命軍團」、「中華青年抗日除奸特務隊」，拿上響亮的革命口號，利用仇恨日本人的心理，煽動青年，煽動軍人，從事反黨反革命非法活動，殺害黨國重要人員，造成紛亂。他們的經費是由廣西李宗仁和廣東陳濟棠供給的，來源充足，所以花起錢來，非常闊綽，收買職業兇手，也比較容易。由於朱若愚細心迅速，一步也不放鬆，從陳變超找到老三，再從老三找到龔柏舟，終於抓住劉蘆隱，搜獲劉蘆隱親批的「中國國民黨革命軍團總章」和「中華青年抗日除奸特務隊計劃書」。才偵破這一件非常重要，關係國家安全的案子。

朱若愚參加工作後，一直沒有和戴先生深切接觸過，不過，因為平時工作表現優異，戴先生非常了解他。這次偵詢刺殺楊永泰的案子，係他自動要求參加，建立大功，戴先生非常高興，當即來電嘉勉。湖北站是個大單位，漢口站是一個十幾個人的小單位，原是兩個不相隸屬的組織，自從朱若愚任湖北站副站長

兼任漢口站長後，漢口站也歸湖北站管轄。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朱若愚升任湖北站站長兼保安處第四科（即諜報股擴大）長。因此，他對戴先生用人不分親疏，惟才是用；有功必賞，愛護備至，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發掘貪污案的真相

鄒世強畢業於漢陽兵工專校第一期，這一個學校畢業的學生出路好，投考的人數多，錄取的標準高，可算是第一流好學校。鄒世強不祇是一位高材生，而且是一位有志氣、有血性的好青年。畢業後，派在漢陽火藥廠工作，負責審核購進的材料。火藥廠廠長譚季陶，聽說是譚道源的親兄弟，官階是少將，德國留學生。因為同兵工界的高級官員關係搞得很好，於是膽大心狠，想好好貪污一筆，終身享受。譚廠長把前任移交下來好多存在倉庫，沒有列冊的機器材料和鉛皮取出來，裝配成好幾部機器，蓋了一棟鉛皮庫房，材料還沒有用光。然後找漢口幾家五金行，開出假發票，說是新由外國進口的新機器、新材料，再向兵工署報銷，這樣一來，就可以貪污好幾十萬銀元。不過，要完成報銷手續，必須要負責審核購料的鄒世強蓋章才能生效。他一看五金行的假發票，非常生氣，這樣貪污，手法未免有點太狠，無緣無故，要國家損失好幾十萬銀元，一轉瞬裝入私人腰包，太無天理良心。於是，拒絕蓋章。譚廠長對他不合作，恨到萬分，藉故將他開革。

不幫助主管貪污，居然會被開除，天地間有這種不合理、不公道的事嗎？鄒世強被開除以後，很不甘心，開始向有關方面告狀，檢舉貪污。想不到告狀告了一年多，得不到任何結果，最後告到武漢行營。當時行營主任由錢慕尹（大鈞）先生代理，把鄒世強的狀子交給行營第三科，第三科約朱若愚商討，並表示這類檢舉書，無異匿名信，可以理，也可以不理。朱若愚接過檢舉書一看，不但有檢舉人的姓名，而且還有住址，怎麼能當做匿名信處理呢？他不主張不理，不妨調查一下。別人不願意多事，但也不會阻撓他進行調查，於是，這件案子也就落在他的身上了。他按住址找到鄒世強的家裏，一見就知道是一個很正派的家庭。他父親是位退役軍人，做過團長。鄒世強呢？無論氣度、談吐，都十足顯示是一個有抱負，有作爲的熱血青年。

「這封報告是不是你寫的？」朱若愚取出鄒世強的狀子來問他。

「是我寫的。」鄒世強並不否認。

「那麼你不敢對控告的各點負責呢？」朱若愚這樣叮嚀地問一聲。

「我檢舉的各點，無一不是事實，當然我敢全部負責，若有不實，情願反坐。」鄒世強回答得非常乾脆。

「你能不能介紹幾位現在火藥廠工作的同學和我見面談談？讓他們做一個旁證，必要時也許需要他們幫我點忙。」朱若愚又問鄒世強。

「可以！」鄒世強告狀了一年多，沒有人理他，好不容易等到今天，才有人來調查，他興奮到無以復加。所以立刻答應，介紹了同廠幾個同學沈漢模、虞洪和朱若愚見面。這幾位青年也是恨透貪污，不怕任何後果，都敢出面作證，證明鄒世強所檢舉的各點，件件真實，毫無虛假。

「你們可不可以帶我到火藥廠，實地看看這些機器和庫房？」朱若愚問沈漢模和虞洪。

「可以，你可以裝做參觀的人，我們帶你進去參觀。」於是，朱若愚跟隨他們進了火藥廠，去看鄒世強檢舉的那些所謂新進口的外國機器和一棟鉛皮庫房。

「這些外國進口的機器，可真不差呀！」朱若愚故意對陪他參觀的人說。

「甚麼外國進口的機器？還不是我們自己廠內的機器裝起來的嗎！」有個工人聽到「外國進口」四個字，好像很憤怒的樣子，並沒有人問他，他却自言自語說起來，聲音很高，生怕朱若愚聽不見。

到這時候，朱若愚才知道，不但鄒世強所檢舉的種種事實，千真萬確，而且火藥廠的員工對譚季陶貪污，普遍不滿，甚至對政府不辦貪污更不滿。所以，這個案子不祇是貪污問題，成了影響政府信譽的問題，相當嚴重。行營根據朱若愚調查結果，報到中央，兵工署再不能置若罔聞，趕緊派了兩位上校調查專員來武漢調查。他們還沒有到達，譚季陶已經在太平洋飯店開好房間，來招待他們。這兩位專員到達漢口，向那幾家五金行取得證明，送到行營，說行營調查的不確實，敷衍了事。朱若愚聽到兵工署派下來的調查專員和譚廠長打成一片，狼狽為奸，非常生氣，就約那幾位火藥廠的同學商量對策。

「這個問題非常簡單，既是外國進口的機器，一定有海關進口的證明單，你去向五金行要證明單看，他們一定拿不出來，拿不出來，不是沒有機器進口嗎？你再查當時的日記賬，賬簿上有沒有機器進口，不是立刻就會露出馬腳嗎？」沈漢模這樣主張，朱若愚一聽他的意見，非常高明，做起來又非常簡單。立刻就去找那幾家五金行，要看當時的報關證明單，和他們公司的日記賬。五金行的老板一聽，可嚇慌了，他們遇到內行，不是好玩的，邀請朱若愚上樓上談話，準備行賄。

「你們不要弄錯，我不是來向你敲詐錢的。」朱若愚對五金行的老闆說：「我是主張公道，要把事情弄清楚。你們要知道，偽造文書，幫人貪污，是犯法的，你會跟上貪官污吏去坐牢，實在不合算。我向你們保證，祇要同我合作，說老實話，我會設法開脫你們，不讓你們纏進這案子，陪人家吃官司。」

五金行的老板害怕到極點，聽他這麼一說，不吃官司，感激得不得了，立刻承認他們是被迫偽造發票，並沒有機器進口。他們爲了做火藥廠的生意，要他們這樣做，他們不得不照辦，想不到會吃官司。朱若愚要他們具了結，另外出一張證明書，說明以前所開的發票是被迫開出來的，根本沒有機器進口。他馬上把這些證明文件呈報行營，然後去找那兩位兵工署的調查專員。

「既然五金行證明機器是由外國進口的，那麼姓鄭的控告不可靠，應該公開審訊一下，也好結案。」朱若愚以行營辦案人的身份，向那兩位專員建議。他們以爲既有五金行的發票做證明，很有把握了結這案子，表示同意。朱若愚在火藥廠佈置了一座臨時法庭，因爲公開審訊，歡迎旁聽。他把那些同廠長共同

舞弊的人員安置在臨時法庭隔壁房間裏，可以聽到法庭這邊說話。朱若愚主審，兵工署的兩位調查專員陪審。他叫來十幾位工人，問他們那些機器和鉛皮庫房的來歷，十幾個人異口同聲說，是利用廠裏原有的材料，由他們親手裝配起來的，並不是向外國買進來。最後又把隔壁的那些人叫出來問話。

「剛才工人們所說的話，你們都聽見了吧？你們承認他們所說的一切呢？還是否認呢？」朱若愚問那批共同舞弊的人，他們不敢否認，祇顧點頭，承認工人們說得不錯。這時候，旁聽的人中間，有許多人起來呈遞報告，有的提出新的控告，有的補充剛才審訊之不足。這些人把多日悶在心裏的憤怒，一古腦兒傾訴出來。

「朱先生！我看不用再問了，剛才所問的結果，已經足夠譚季陶承担了。」兩位陪審官之一這樣說。「人家既然出面告狀，我們就不能拒絕不接受呀！」朱若愚接受了所有的控訴，才結束了審訊。兵工署的那兩位上校調查員丟盡面子，同時也知道了那幾家五金行已經提出反證明，再沒有辦法袒護譚季陶了。連太平洋飯店都沒有再回去，一直到了碼頭，搭上江輪，滾回南京。第三科把經過情形報告了錢大鈞主任，錢主任立刻下令，把譚季陶扣押，一直到抗戰勝利，才釋放出來。這件整肅貪污的案子，不但爲國家保留下幾十萬銀元，不讓裝進貪官污吏的腰包，而且大快人心，穩定了火藥廠員工不滿意的情緒。假如不是朱若愚辦事認真，堅定立場，一步也不放鬆，這一件大貪污案子就不會辦得這樣徹底，這是軍統局的同志辦理的第一件重要貪污案子。

武漢反資敵大破壞

武漢淪陷，是在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淪陷以前，戴先生奉命執行反資敵大破壞。當時湖北站站長爲朱若愚，這項任務當然由朱若愚負責執行。十月初，戴先生即到達武漢，親自策劃督導。首先他介紹朱若愚和武漢警備司令郭懋見面。因爲此項破壞任務，名義上是以郭爲主，戴先生爲副，朱負責執行。郭懋雖不表示反對，但態度非常冷淡，對這項任務並不感興趣。

「你要知道！我們不能希望郭司令幫助我們甚麼，祇要不阻撓我們，已經很好了。你必須忍耐，不能同他發生任何不愉快，才能減少阻力。」看罷郭懋，戴先生囑咐朱若愚。爲達成任務，戴先生往往能忍別人所不能忍的。他早已調派一百名臨訓班的同學到武漢工作，以其中六十名學過爆破的專家，供朱若愚運用。這是一批生力軍，最得力的助手，執行任務，不會打折扣。每一個破壞的目標，朱若愚都派一位同學負責。按照計劃，漢陽兵工廠，一切可以資敵的倉庫、碼頭、橋樑、建築，以及不能移動的物資，都要澈底破壞，不讓落在敵人手裏，變成侵略我們的力量。爲使武漢反資敵大破壞，做得澈底切實，戴先生召集在武漢的重要同志李果謐、唐新、趙世瑞、朱若愚等開過幾次會。李果謐爲武漢淪陷後的武漢區長，唐新爲副區長，趙爲當時的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

提到李果謐，順便把他個人的故事略加敘述。李果謐態度瀟灑，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擔任過特務

處的書記長，七七事變前任北平區區長。事變後調往後方，曾偕同梁幹喬到河南，到太原，佈置淪陷後的一切工作。他同湯恩伯將軍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獲得湯的同意，在山西成立十三軍游擊隊，許多山西的軍事幹部紛紛投向李果謀麾下，引起第二戰區的惶恐，閻百川先生表示反對十三軍在山西成立游擊隊，湯恩伯怕得罪閻先生，否認十三軍游擊隊組織。結果，協助他工作的張存仁、侯定邦被第二戰區關起來，羅夫之和袁寄濱等逃往西安，李果謀回到漢口，氣得害了一場大病，幾乎要了命。閻百川先生害怕李果謀成立游擊隊，却信任薄一波、戎伍勝等共產黨，讓他們成立新軍，僅僅一年半的光景，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冬，新軍叛變，拖走四十個團，佔據了山西一半以上的地盤。李果謀是一位游擊專家，假定閻先生不反對成立十三軍游擊隊，湯恩伯也不否認，而能順利成立，足以對抗共產黨的新軍，山西的局面也許會好一些。後來李果謀在漢口被敵人逮捕，又因為駐武漢的日本憲兵司令部課長五島中佐和他都是日本士官學校學生，因此沒有殺他。

戴先生主持最後一次會議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過黃陂，距離漢口祇有三十多里。趙世瑞顧慮戴先生的安全，他說：「戴先生！敵人距離漢口已經很近，可以聽見敵人的大砲聲音。武漢的破壞工作，留給我們來執行，你應該先走了。」

「噫！我了解你，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開。等我走了，武漢還會找到你的影子嗎？」戴先生這樣說，好像連趙世瑞的心都看透了。他偕同朱若愚視察每一處準備破壞的地方，看看準備的確實不確實。一直

等到敵人的先頭部隊已經到達漢口，破壞開始，戴先生才離開武漢。朱若愚指揮破壞，一絲不苟，爲抗戰以來，最徹底的一次反資敵大破壞，敵人聽到爆破的聲音，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半天不敢開進漢口。敵人佔據武漢，一無所獲，大感失望。

朱若愚陪同戴先生到各處視察的時候，戴先生說：「等到武漢的破壞工作執行完畢，我打算派你到上海去負責。」

「我到上海去工作，恐怕不適宜吧？」

「爲甚麼？」戴先生有些大感意外。

「我是一個笨人，不會嫖賭，不會跳舞，祇能老老实實，按照笨人的笨法笨做，那裏能應付上海的那套海派作風呢？所以，我覺得應付不了那種環境，工作不一定能做得好。」

「你真的應付不了那裏的環境嗎？那真是一件無可如何的事。」戴先生知人善任，經過這次談話，經過這次武漢大破壞，破壞的確實徹底，他對朱若愚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以後再也沒有提過調上海工作的事。

後來宜昌失守，有人報告戴先生，湖北站的情報做得不够好。局本部派李修凱去湖北調查，他把宜昌失守前後，湖北站逐日的情報看過一遍，知道湖北站已盡到應盡的責任，并無失誤。

「你去湖北，調查的結果怎樣？」李修凱調查完畢，回到重慶，戴先生問他。

「宜昌失守，湖北站的情報沒有失誤。」李修凱回答，本來這樣回答，已經回答完了，可是，李修凱是個喜歡挑剔的人，沒有大毛病，也會雞蛋裏找骨頭，找些小毛病，他說：「不過朱若愚同志用錢，有些放不開手，該花錢的地方，他都盡量少花。」

「你根本不懂，我用朱若愚，就是因為他用公家的錢，比用自己的錢還要節省。」戴先生對朱若愚了解 and 信任的深刻，由此可知。

經過這次反資敵大破壞，戴先生簽呈 委員長個別召見朱若愚，特予嘉勉。而朱若愚也對戴先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信仰。他體會到戴先生執行 領袖交付的任務，不折不扣，做得非常徹底。對戴先生不怕危險，對於艱鉅任務，又必親自指導，這種鞠躬盡瘁，冒險犯難的精神，也是平常人所不能及的。

涓滴歸公月白風清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財政部緝私署成立，先派朱若愚為湖北緝私處處長，一個月後，又改派劉培初為處長，朱若愚為副處長。處長也好，副處長也好，他祇知工作，不計地位。處長未到以前，緝私處的工作仍舊由他主持，毫不懈怠。當時李宗仁的第五戰區，由河南潢川移駐湖北老河口，鄂北方面走私風氣甚熾，緝私署特設一豫鄂辦事處於老河口，由朱若愚負責。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三月，戴先生親至老河口視察緝私工作，時朱若愚正在恩施，戴先生要他立刻來老河口晤面。恩施到老河口，完全是山路，要

走八天，才能到達。他接到電報，立刻動身，早起遲宿，有時日夜趕路，希望五天或六天走完八天的路程。不料天不作美，突然下起雨來，山路難行，無法走快。等他到達老河口，戴先生已經到了洛陽，給他留下二千元特別費，和一封親筆信：

若愚吾兄大鑒

聞兄星夜奔馳，想來長途跋涉，必甚辛苦也。弟于前天到此，刻因四一大會期迫，急須回渝，加以天已下雨，恐道路將益泥濘，不能行動，故決今日回洛陽去。兄抵此後，如此間有便車赴西安，則尚可于西安謀把晤也。因弟于十七日以前尚在西安也。未能留此相候，甚歉。鄂北緝私工作急須佈置，前貨運稽查處緝私部份人員之接收與稅警之接管，望兄迅行交涉。而對於襄樊老河口均鄖等處秘密工作之佈置與加強，又須兄完全負責也。至緝私分處副處長辦事處似可與老河口查緝所合併辦公，以期人力之集中，而利工作也。此間經費一時不濟，可向中央銀行借用若干，弟已函中央于經理爲兄介紹矣。兄來此後，對此間各部門工作，請密切聯繫，多加指導爲荷。匆此留上，敬頌

大祉！

弟笠手上 十一日晨

兄如能於十七日以前至西安，請到玄風橋十四號找我。如無便車，則作罷論。附上國幣一千圓，爲兄旅用之助。

弟笠又及

因爲鄂北工作重要，走私嚴重，戴先生很想和朱若愚親自談談，可是時間又不許可久等，所以才留下

這封文情並茂的親筆信。從這封信的開頭「聞兄星夜奔馳，想長途跋涉，必甚辛勞也。」到最後「附上國幣一千圓爲兄旅用之助。」可以看出戴先生對於同志關懷愛護，熱情洋溢，讀來令人感奮。戴先生對於工作指示，從接管機構，調整組織，加強佈置，以至經費措施，無一不注意，無一不具體而確實。他能够令人心服口服，就在這些地方。四一大會後，稅警團孫團長到老河口，戴先生又着他帶了一封親筆信給朱若愚，更可以看出他對老河口方面的走私情形是怎樣關懷注意了。

若愚吾兄：

鄂北一帶向來走私之風甚熾，在此抗戰時期，當更甚也。茲因孫團長赴老河口之便，特函介紹諸兄詳商緝私之方，以期增進稅收爲要。此頌

助綏！

弟戴笠 四月二十一日重慶

要想鄂北走私絕跡，必須第五戰區李宗仁的驕兵悍將不幹走私的勾當。所以鄂北緝私，無異與虎謀皮，困難重重，的確很不容易。朱若愚執行戴先生的命令，也要做到不折不扣。如果態度軟弱，李宗仁的那批走私能手，就不會把他放在眼裏，必然走私如故。如果態度強硬，一定會同那些驕兵悍將衝突，鬧出很大的麻煩。朱若愚應付這種極端困難的環境，不聲不響，先禮後兵，先拜謁李宗仁，弄好上層關係。他非常尊敬李宗仁，說明國家財政困難，緝私工作的重要，請他大力支持。人人都喜歡戴高帽子，李宗仁自然

也不例外。李宗仁既然表明態度，支持緝私，那些驕兵悍將就不敢公然走私了，祇好偷偷摸摸，也不敢和緝私人員作對，問題自然就不嚴重了。朱若愚的態度嚴正而溫和，絲毫不苟，而本身健全，令人敬畏，鄂北的情況大為改善，緝私工作也發揮了很大作用，漸漸達到戴先生期望的增進稅收的目的。

戰時沿海工業城市淪陷，抗戰根據地轉移到西北和西南山區，對外交通困難，物資缺乏，越來越嚴重。三十二年冬成立貨運管理局，負責搶購搶運物資，朱若愚又奉命兼任湖北貨運處處長職務，肩負經濟作戰的重担。他不論担負甚麼任務，無不盡力以赴。他派出得力人員，到武漢搶購，運到巴東，再由長江逆流而上，一船一船運到戰時國都重慶，成績卓著。

宋子文先生接任行政院長後，採取拋售黃金政策，而各地的金價不一，由西而東，越東越貴。宜昌比巴東貴，沙市又比宜昌貴，沙市比巴東幾乎貴一倍。當時規定，手續簡便，經手拋售人祇要說明售出的地點和時間，符合當時當地的價格就成。所以，在沙市前線售出，說成係在巴東售出，自然就可賺到一倍的利益。經朱若愚手售出的黃金，數目很大，都是派人運到沙市售出，得到很高的售價，實售實報，涓滴歸公，真正做到清白家風。

勝利前一年，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戴先生為朱若愚的前途着想，保送入中央軍校高教班。當時他負擔的責任非常重大，湖北方面簡直離不開他，可是戴先生還是讓他離開了。戴先生對他說：「你沒有軍校的學歷，一旦抗戰勝利，你在學歷上，要吃很大的虧。為你着想，非入高教班不可。還有一點，

你的身體太壞，非鍛鍊不可，假如一直讓你留在湖北工作，你又不肯馬虎，身體非拖垮不可。所以，爲使你將來負擔更重大的責任，爲使你的身體鍛鍊好，我才不願湖北的工作，決心送你入高教班受訓。」

朱若愚回到重慶，結算貨運處的賬目，繳回現款七十多萬元。當時張冠夫負責貨運局會計部門的責任，對於搶購物資，付出價款之高低，售出黃金，收回售價多寡，瞭如指掌。他對朱若愚繳回七十多萬現款，深受感動，給戴先生上了一個簽呈，大意說：「查湖北站出售黃金與變賣美鈔，賬務之明，手續之清，朱若愚同志爲全國之冠。此次赴蓉求學，囊內空空，可否將不應繳庫而繳庫之七十餘萬元內提出若干，發給朱同志，以壯行色，敬祈核示。」

戴先生批示發給朱若愚同志特別費十萬元，這十萬元對朱若愚而言，並不重要。而張冠夫的簽呈道盡他多年來涓滴歸公的苦心，却給他精神上極大的安慰。

戴將軍話未來任務

朱若愚到達成都，入了中央軍校高教班，放下千斤重的担子，精神負擔輕鬆了許多，身體果然漸漸強壯起來。有一天，有一位地位非常重要的高級將領到軍校訓話。大意說：「共產黨不足爲害，一旦抗戰勝利，不用三個月的功夫，就可以剿平。」這位將軍講話時，氣概萬千，真是不可一世，根本沒有把共產黨放在眼裏。因此，勾引起朱若愚的回憶，他記得七年前戴先生曾經在武漢講過一次話，同這位將軍所說的

比較一番，他們兩位的看法，剛好相反。

二十七年武漢撤守前，戴先生曾召集在武漢的同志（包括警察）一千多人訓話，他說：「我們同仇敵愾，全民起來抗戰，不管日本怎樣頑強，佔據我們幾處城市，終久還是要被我們打敗的。我告訴你們，我們國家的真正敵人，國家的心腹之患，不是現在的敵人日本軍閥，而是將來的共產黨。現在共產黨表面上抗日，服從中央，實際上是借上抗戰來擴張力量。一旦抗戰勝利，他們必然要起來叛亂。所以，我們將來的麻煩，要比現在對日抗戰，麻煩的多。」

戴先生講過這些話快四十個年頭了，當年講話的神情，朱若愚至今記憶猶新。某將軍說不出三個月，就可以把共產黨剷平，剿匪時他又担負了很大的責任，不但三個月沒有剷平，剿了三年，反而失敗了。假如某將軍能像戴先生的眼光那樣遠大，料事如神，提高警覺，不要驕傲，又何至於失敗呢？戴先生的識見，能不永遠使人懷念嗎？